

編後語

自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在1989年提出「文化中國」的說法以來，相關的學術討論（如「大中華圈」、「華語語系」）續有發展。三十年匆匆過去，在國際環境經歷深刻變化的當下，值得重新思考的是，「文化中國」的建設有何現實意義？本期「二十一世紀評論」刊出的三篇文章，分別從歷史、文明和文學的角度作出反思。徐國琦以歷史學家的筆觸，細說張彭春參與起草《世界人權宣言》（*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*）與孫中山創立三民主義的昔日往事，說明中國傳統文化蘊藏豐富的現代思想資源，可資利用來建設二十一世紀意義下的「新中國」。彭國翔以亨廷頓（Samuel P. Huntington）的「文明衝突論」作為引子展開討論，指出現代中國文明以馬克思主義為主、中國傳統與西方文化為輔，形成「一元主導，三分天下」的格局；長遠而言，他認為「和而不同」對於一個健全文明的茁壯成長至關重要。宋明煒從二十一世紀的角度回眸二十世紀梁啟超的「新中國」想像，通過對幾部呈現「科幻性」的當代華語小說的剖析，在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地圖上重訪「新中國」的未來，內容不乏深意，甚具啟發意義。

本期刊出的學術論文關涉政治、文化、教育等範疇，四位作者均嘗試通過宏觀與微觀的研究，審視近代中國歷史上「中心」與「邊緣」的政治互動與文化激盪。近年圍繞「新清史」的討論愈益受到注意，爭議關鍵無非是滿人的主體性問題。王泉偉借用政治學的「軸輻式帝國理論」，以政治權利的角度切入，探討清帝國的多元支配結構及其動態演變，試圖調和有關「漢化論」的爭議。張夢婷的研究揭示，抗日戰爭時期西雙版納興辦新式教育的過程中，國家權力滲透當地社會文化網絡中的佛寺體系，與傣泐政權及廣大民眾發生互動，伺機建構權力的合法性；隨着西南地區戰略地位的提升，出於啟發民智與抗戰動員的考量，過去備受冷落的邊疆教育重新提上國民政府的議事日程。中共建國初期推行邊疆少數民族文字改革時，牽涉複雜的政治、文化、外交等因素，內蒙古新蒙文改革之路尤其曲折，自治區最早於1955年揚棄舊蒙文，改用新蒙文；至1958年停止推行新蒙文，更曾一度考慮採用拉丁蒙文，但最終沿用舊蒙文至今。段世雄的文章利用內蒙古檔案梳理箇中的來龍去脈，饒富學術價值。國府遷台後，台灣自由派人士開始深刻反思台灣民主改革問題，反對黨的重要性是其中的核心議題。任育德探討在文化冷戰的宏觀背景下，台灣和香港的自由派人士如何通過兩地出版的政論刊物，在東南邊陲形成和發展反對黨議題的跨域討論，並縷述美國半官方民間機構亞洲基金會（Asia Foundation）在背後扮演的推動和資助角色。